

# 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

■ 李金铨

[内容提要]直觉智慧,言简意赅,但不太交代推论过程,以致容易歧义丛生。直觉智慧应该适度降低抽象层次,与严谨的社会科学语言和逻辑互通。本文以苏轼《题西林壁》诗为引子,举出研究实例,探讨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的三个主要问题。第一,社会真实的多重建构,既非单一,亦非无限;真实的整体犹如瞎子摸象,不是简单的部分与部分拼凑而成,其建构涉及权力中心与边缘的关系。第二,不管是国际传播或是新闻史,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必须互相渗透,从沟通对话中获得互为主观的同情了解。第三,社会科学及传播研究旨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、复杂性和矛盾性,要能见树又见林,分析的角度和结论跟随重要的条件而变化,故必须捕捉时间(历史)与空间(全球)如何影响事物的“常与变”及其变化的“同与异”。

[关键词]直觉智慧 社会真实的建构 局内人/局外人 国际传播 新闻史

## 一、前言

做学术工作总会碰到奇特的“书缘”,譬如终生难忘的“友缘”。这种书和朋友不必多,但得到了就一辈子受用。早年求学时期,邂逅了米尔斯(Mills, 1959)的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,让我明白了自己想做什么样的学者,从而建立学术风格与研究旨趣。米尔斯强调,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与公共议题,而且任何重大问题都必须放在历史(时间)的视野和全球(空间)的架构中考察。他还细致地刻画了学者的生活方式、治学的态度,以及开拓想象力的各种方法,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学术研究的艺术境界。当时我正在摸索学术门径,米尔斯不啻提供了一副指南针:原来学术与生命是不应该割裂的,而是彼此活

---

李金铨: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(Chin-chuan Lee,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,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)

在一个同心圆内,由内向外扩张,连成一脉,个人的心路历程不断与社会结构有机互动。

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,纵横自如,超越学科窄框,却又论理严谨,证据丰富。我曾自许要发展深刻的问题意识,从远处大处着眼,并发展各种组成的环节与细节,以期以小见大,并愿意承担社会伦理与学术责任。我的学术生涯一直在国际传播的领域摸索。近十几年来,我特别关注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,旨在探讨如何从在地经验彰显和接通全球视野,一方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,一方面又能提升到普遍性的理论,庶几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(Lee, 2015)。此外,我也对新闻史——特别是民国报刊——发生兴趣(李金铨,2008,2013a)。

我自1978年开始教研工作,一路走来,到明年退休时整整满四十年,好像刚开始就要结束了。这四十年,大概有一半时间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,一半时间在香港。因为工作环境的需要,我使用英文写论文的机会竟比中文多得多。我整理了过去十年陆续用中文发表的关于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的论文,准备结集,以《传播纵横: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》为题出版,为的是给退休留下一个纪念。在编辑的过程中,深感学海无涯,而个人的生命与才情有限,体会到庄子说的“如鼯鼠饮河,不过满腹”,思之不禁唏嘘、悚然而汗颜。这篇文章允为该书的导读。

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缘。我在香港城市大学,有幸参与了媒体与传播系和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。2005年开始,无心插柳柳成荫,更创立了“中国大陆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到访项目”,至今已有两百多位学者参加,遍布大江南北各重要高校。他们是当前中国传播研究的中坚队伍,有的已成长为学界翘楚。我从《论语》的“友多闻”取义,名曰“多闻雅集”,象征由“博学多闻”的“新闻人”所成立的朋友圈,彼此互称“多友”。多友们熔友谊和学术为一炉,已蔚然形成一所风格独特的“无形学府”(invisible college)。2015年暑假“多友会”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举行,我应邀发表主题报告。这篇文章是病中根据当时的报告录音勉力扩充而成的。

## 二、直觉智慧与社会科学

我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,又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,常常思索如何才能彼此融会贯通。这是必经之路,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慢慢摸索,累积了一些感想,不妨在此提出来抛砖引玉。

中国的人文传统注重直觉的智慧,经常寥寥数语下一结论,充满了洞见,令人豁然开朗,却不太交代推论的具体过程。宏观思考喜欢刻画大轮廓,较少有细部的理解,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有些直觉的智慧包含的经验丰富而深刻,例如从《论语》抽出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这句话,不必用抽象逻辑的推演,一般人便了然于心。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传统。不过,直觉智慧的缺陷在于有些话说得太过精简,往往话中有话,意在言外,甚至互相矛盾,亦未可知。

倘若将学术比喻为一座金字塔,塔尖当是智慧,塔底是基本材料,社会科学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建筑。现代社会科学是靠概念、逻辑和证据三部分有机的结合,每篇文章有论旨、有推理、有证据,不仅要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。一方面,我们把林林总总的材料,用概念化赋予秩序,提升它的抽象度到中观的层面。没有概念化的工作,材料就像羽毛乱飞,整合不起来;一团毛线看似纷乱,要是找出线头,便可以理顺秩序,而这个线头就是概念化。一方面,应该适度降低智慧的抽象层次,一层一层明白地解剖,透过严谨而细致的论证,步步推理,严谨有序,不能随意跳跃,最后用证据证伪或证实,判断论旨是否站得住脚。

我们不妨引用中国人的话语(包括成语、格言、诗词或经典)来阐释治学心得。这些文化瑰宝总结民间智慧,描写人生经验,言简意赅,字字珠玑,三言两语,尽得风流。中国文字崇尚简约,意象丰富,朦胧最美,称得上最富诗意的语言,而诗无达诂,解诗人可以驰骋想象力。但以中文写起硬邦邦的法律文件,却暴露出它的逻辑结构不够严谨。传统上,中国的政令和法律习惯于宣示一些抽象的大原则,然而根据这些原则所制定的施行细则却不够具体而精确。中国人的话语又常常讲得太精太简,语焉不详,再加上只借助直觉,而不诉诸严密的逻辑推理,难免歧义横生。许多话语背后,甚至出现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话语,令人纳闷而无所适从。回到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这句话,作为普遍伦理原则是颠扑不破的;但在特殊的情况下,己所“不欲”而施于人,可能两全其美;反之,“己所欲,施于人”的命题,有时成立(兼善),有时不成立(霸道),端看各种条件与情况而定,未可一概而论。

中国人文经典的魅力所在,也许正是这种“道可道非常道”、意在言外的空灵玄妙之意境。但社会科学所道(articulate)者,不是“非常道”,而是可道之“常道”,而且意在言“中”,不是意在言“外”,总是力求明白准确,减少争辩或误解的空间。所以,社会科学严谨的逻辑足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谜团:首先,剥解话语的层层意思,缩小并明确其语义,语义的维度具体化以后,比较不易歧义丛生;其次,确定不同话语的局部适用范围,使它不能漫溢到范围之外;最后,裁断并安顿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。简言之,设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(成语、预设、论述),必有三种可能的逻辑关系,三者必居其一:或两说互相排斥,若甲说对,则乙说必错,反之亦然;或在不同的语境或条件下,两说俱言之成理;或两说互相支持,唯解释力不同,以其中一说为主,另一说为辅。

我始终觉得,一流的学者必有一流的直觉,他们透过长期的耕耘获得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,不仅嗅得出问题的重要性和精微处,而且有能力把这种直觉转化为社会科学的语言与思维方式。中国直觉智慧与社会科学是可以互通的。互通成功与否,取决于三种特性:一是叙述性,概念能够准确描述民间话语和经验实践;二是解释性,概念层次井然,刻画复杂的面相,推断因果关系,并赋予意义;三是普遍性,从具体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,可以跟西方的学术平等对话。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,也是重要的贡献。

社会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,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,道路崎岖。传播研究尤其年轻,

尚未定型。向西方学习是必经之路,但在此关键时刻,必须趁早提醒自己:一方面追求专业的严谨规范,一方面谨防落入过度专业化而划地自限的陷阱,以致异化为技术化、碎片化、孤岛化的窠臼。理论范式学到一定程度之后,便要深刻反省哪些对母社会与母文化是适合的,哪些是不适合的。最后,一方面也要超越西方的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,一方面要警惕“义和团”式的学术民族主义借尸还魂,而要切切实实发现真问题,拿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重大业绩,回馈给西方乃至世界的学术圈。等到哪天我们有这样的实力和业绩,便足以和西方平等对话。这是一条漫长的学术道路,必须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。

### 三、社会建构:国际传播与新闻史

我想以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为引子,说明我对社会科学(特别是传播研究)的一些看法。这首千古名诗共四句,二十八个字,栩栩如生地描写了无穷的审美意象。这个审美意象竟暗合了社会科学的逻辑意蕴,通透而具体,实在是中国直觉智慧的极致:

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以此出发,我准备探讨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的三个关键问题:第一,有没有绝对的真实?第二,局内人与局外人观点的互相渗透;第三,常与变,同与异。这三个问题其实息息相关,浑然密不可分,勉强分开来只为讨论的方便。<sup>①</sup>

#### (一)多重真实的建构

我先从苏诗第三句讲起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,然而什么是“真面目”?中国国画往往写意多于写实,人们看庐山是重意抑或重实?要是庐山的“实体”可以完整而全面地呈现,有谁得而识之?西方哲学经常设定上帝为真知和全知的造物主,以此论断人类的有限性,从而建立各种理论论述。佛教也说,佛陀觉已觉人,超脱六道轮回,而众生执迷不悟,因贪嗔痴而无明,观看事物和体验人生直如“瞎子摸象”,只看到表面,看不到本质。“瞎子摸象”的故事出自《长阿含经》第19卷,记叙十分生动:

……时,镜面王即却彼象,问盲子言:“象何等类?”其诸盲子,得象鼻者,言象如曲辕;得象牙者,言象如杵;得象耳者,言象如箕;得象头者,言象如鼎;得象背者,言象如丘阜;得象腹者,言象如壁;得象髀者,言象如树;得象膊者,言象如柱;得象迹者,言象如白;得象尾者,言象如絙。各各共诤,互相是非,此言如是,彼言不尔,云云不已,遂至斗诤。时,王见此,欢喜大笑。尔时,镜面王即说颂曰:“诸盲人群集,于此竞诤讼,象身本一体,异想生是非。”

在这个故事里,镜面王是大彻大悟的佛陀化身,具有直观世界本真的神通,故曰“象身本一体”;但众生凡人犹如诸盲,没有这种神通,摸到象的一小部分(鼻、牙、耳、头、背、腹、髀、膊、迹、尾等),便自以为是大象的全貌(如曲辕、如杵、如箕、如鼎、如丘阜、如壁、如树、如柱、如臼、如组),于是争讼不已,乃至“异想生是非”(张冀峰,2016)。看“庐山真面目”譬如瞎子摸象,即使庐山有完整的物质存在(material existence),人们的感官和认知受到严重的局限,不管身处山内或山外,观察到的图景永远是局部的和片面的,而无法窥其全貌。纵然借助最新的科学仪器,例如卫星定位和航空拍摄,也必然牵涉角度和位置的问题,横侧歪斜,远近高低,都会影响取景的不同。

这里先举一个国际传播的研究案例,庶几赋抽象的阐述以具体感。2017年恰好是香港主权回归20年。1997年香港回归,允称举世重要的“媒介事件”,吸引了数千名各国记者前来采访。当时,我和同事陈韬文、潘忠党以及苏钥机深度访问各国记者,并对他们的报道(包括报刊和广播电视内容)做了详尽的话语分析,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归纳其“意识形态束丛”(ideological packages),进而从新闻视角联系到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(Lee, Chan, Pan & So, 2002)。当时冷战刚刚结束,各国记者感兴趣的是中国,而不是香港。新闻报道占据各种光谱,形成一场意识形态的话语角逐:

中国强调,香港回归雪洗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民族耻辱,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及其高瞻远瞩的“一国两制”政策,香港回归成为可能。(冷战期间,香港是中国对外的主要窗口,它能够保持现状,是因为毛泽东订下“长期打算,充分利用”的政策方针。)香港和台湾的报道以“文化中国”冲淡“政治中国”的调门。

英国媒介缅怀昔日帝国的荣光:英国打下良好的基础,香港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国际都会和金融中心,这是“具有英国特色的中国人成功的故事”。但报道绝口不提鸦片战争,反而讽刺香港的难民源自动荡的中国。英国建构的话语,完全符合它离开殖民地时一贯的口径——“我们给世界带来文明”——正是萨伊德(Said, 1993)所揭橥的典型“东方主义”。

美国报道惋惜“东方之珠”送入“虎口”,英国人离开以后,唯美国有力量 and 道义责任挺身护卫香港的“自由民主”与生活方式。美国既非宗主国,凭什么干预香港事务呢?没有别的,就是国际霸权的意识形态在作祟。

澳大利亚的报道呼吁要采取独立于华盛顿和伦敦的外交政策,但易说难行,媒介报道充满了反对中国的偏见,几乎与美国无异。此外,大量香港移民进入加拿大,中文成为英语和法语之后的第三大语言,加国媒介声言香港回归直如国内新闻的延长。

日本最关心的是经济,不是政治——香港能否继续稳定,有利于其商业利益?自由民主并非主导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,日本媒介以第三者的角度报道中美英的争斗,自己尽量不介入其中。



从现象学的角度,这个案例阐发了六层意义,以下逐一讨论。第一,移步换景,看到的景观就不一样。远近高低各不同,难道远的对,近的就不对,高的对,低的就不对?显然不是。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,远看近观各有长短:看得远,轮廓清晰,细节模糊;看得近,细节清晰,轮廓模糊。太靠近的历史有太多的遮蔽,不容易看清真实,就是这个道理。所谓“境由心造”,一样山水多样情。对于外在客观景物的理解,往往是内在心理活动的投射,且涉及观察者的处境及周遭的条件,这是主观和客观交融互动的社会建构,即是“互为主观”(intersubjective)的过程。世间没有绝对客观的单一真实(reality,或现实),而是由各种解释社群从远近高低的角度,建构“成岭”或“成峰”的多重真实(multiple realities)。因此,我常觉得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对,也没有绝对的错,观察的角度和位置不同,得到的结论往往也有异。

在香港回归的国际报道中,各国的话语都有“本质化”的倾向,突出对自己有利的论述,抹煞其余,甚至彼此针锋相对,犹如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。当然,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,因为涉及意识形态的斗争。即令如此,不是说你主观,我也主观,主观与主观之间就是永不交叉的平行线,只能各说各话,甚至必须斗得你死我活。须知意见不同,或多或少还是可以互相沟通了解的。真实既是主客交融的建构,解释社群之间不是绝缘体,那么,彼此在善意和尊重的基础上,追求共同的目标与价值,透过反复不断的倾听、辩论和对话,设身处地,当可获得某种程度的“同情理解”(empathetic understanding)。倾听使人谦逊,知道对方并非完全无理取闹,己方的意见也并非尽善尽美,往往只是一种权衡之下的选择,明乎此,大家就不必剑拔弩张了。当然,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完美,沟通也不可能尽善。谈不拢的暂时放着,求大同,存小异,继续努力,这正是民主的真谛。

第二点,顾名思义,“multiple realities”摆明是“多于一种”的真实建构,是复数的,却不是“无限多”的,否则必流于虚无主义,不但知识系统割裂到丧失立足点,人类沟通也将完全不可能。英国史学家卡尔(Carr)说:

不能说:因为一座山从不同的视角好像呈现不同的形状,所以客观上是没有形状的,或是有无数的形状。也不能说:因为诠释是建立史实必要的一环,因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诠释是完全客观的,所以一个诠释和另一个诠释一样好,而原则上史实是无法客观诠释的。(Carr, 1964, 26-27)

我大致接受这段相当精辟的话。但如何做到“客观诠释”,怎么样才是客观的标准呢?我以为现象学关于“互为主观”的主张还比较切实。因为真实不是简单而自明的,必须彼此在对话、辩驳和意会的过程中,从各种角度揣其大意,以获得同情的理解。不用说,在这些多元或多重的真实中,有的建构当然更深刻更有意义。绝对主义只承认一种正确的解释,而极端的相对主义则接受各种标准不一的解释,犹如俗话说的“捡到篮子就是菜”,过犹不及,这两种立场应为智者所不取。

第三点,主导建构“多重真实”的因素是什么?可能是阶级、种族、肤色、科技、经济、意识形态、文化价值或国家利益等,有些因素在若干的议题或事件上特别突出,这些因素也可能发生交互作用。按照这个逻辑,我们相信多因多果,而不愿意接受单因论,也排拒各种先验的决定论,例如阶级决定论、经济决定论、科技决定论,或历史决定论。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,报载一位非裔女法官到中学演讲,勉励贫困的同学只要努力必可爬上去,改变社会阶层。但她自叹,穿起法袍,人家尊敬她是法官,一旦脱下法袍,出了门,人家说那不过是个黑女人。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肤色是不能改变的,阶级和肤色即使互为相关,却无法互相取代。在上述香港回归的案例中,显然国家利益超越其他因素,成为媒介话语的驱动力。

第四点,社会学假设整体大于个体的总和,真实的建构不是各个版本一加一机械式的拼凑。以香港回归为例,即使把各国媒介的报道拢合起来,难道就是报道的全貌?当然不是,因为不在样本内的国家很多,而受访各国内部也有主流和支流的差异。横岭侧峰,不论单独或合起来,都不是庐山的整体。再如瞎子摸象,有的摸到鼻子,有的摸到眼睛,有的摸到大腿,不一而足,但这些部位加起来也无法构成大象的全貌。同样的道理,假如挑选最好的前锋、中锋、后卫,组成一支篮球队,这些大牌明星队员可能各自唯我独尊,互相拆台斗气,以致败绩累累。相反,衰兵可能制胜,因为他们敌忾同仇,有默契,一鼓作气。在分析上,我们必须注意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有机互动,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整体的凝聚力。

第五点,话语建构即使多元化或相对化,版本之间仍然避不开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,并非所有的话语都是等量齐观的。国际新闻众声喧哗,深受各国利益的影响。边缘小国根本很难走上国际舞台发出微弱的声音。而强国的话语,以英美的新闻报道为例,又是“内外有别”的:由于它们笃信“新闻专业主义”,国内新闻比较能够反映多元的利益与观点,国外新闻则因国家利益超越党派,口径和视野往往比国内新闻更单一。西方的“新闻专业主义”强调客观公正、不偏不倚、事实与意见相剥离,这些原则必须深植于一套“恒久价值”(enduring values)的假设之上,例如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自由民主制度、负责任的资本主义、个人主义以及不走极端(Gans, 1979)。除非媒介冻结最高层次的假设,把既有社会构成的基础视为当然,否则操作性的新闻专业主义必将无法落实。

第六点,毋庸置疑,整个传播研究(包括国际传播领域)是由西方(尤其是美英)的学术笼罩和主导的。这里,我不禁想起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巨擘哈贝马斯(J. Habermas),他的“公共领域”(public sphere)理论在英语世界享有盛名,也曾一度在华人学界中风行。不少年轻学生没有读过(别说读通)哈贝马斯,但大概觉得“公共领域”是动人的口号,所以在申请博士班时动不动就宣称要研究新媒体的“公共领域”。有一年,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办的暑期班问道:“许多人断章取义,抄录一段哈贝马斯的话,接着就迫不及待甚至不假思索地加以演绎。为什么碰到‘哈贝马斯说’,跟着就‘由此可见以下几点’了呢?”众笑,因为听者也明白诉诸权威是有问题的。其后不久,我在台北参加传

播学术年会,某位年轻学者一五一十地追溯哈氏的哪本书怎么阐释“公共领域”,最后总结说台湾地区社会的“公共领域”不够成熟。我应邀讲评时开他玩笑:“你把哈贝马斯的一家之言当成‘圣经’,难怪你做起了‘查经班’的工作。但你想骂台湾社会的‘公共领域’,方法很多,何必绕一大圈抬出德国权威来壮胆?”哈氏的“公共领域”有特殊的历史语境,包含了分析面和规范面,不能照搬。我建议他不妨借助哈氏的观点以活络思想,但最后必须落实到在地经验的分析,不能以议论代替分析,更不能奉哈氏为评断一切的“真理”。这两件事差不多发生在同时,我相信具有典型意义,而不是巧合。有趣的是“哈贝马斯热”退潮以后,华人学界又转而追逐新的偶像了。

我们如何从优吸收西方学术,而不沦为它们的“翻版”,又如何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?这正是我关注的主要旨趣。我一再强调反对极端的实证主义,搬一个貌似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命题或理论,在各国反复谋求经验上的印证。另一方面,我们如何处理各种霸道的文化中心主义(ethnocentrism)横行?有些作者为了反对西方霸权,建构在我看来相当封闭的“非西方”(亚洲、儒家或非洲)模式。<sup>②</sup>我不反对建构“非西方”模式,但前提是理论必须开放,愿意和西方平等对话,断不能像原教旨派似的,假设“非西方”天然占据道德高地,因而走向批判对象的反面。

郭振羽教授(Kuo & Chew, 2011)提出的方案比较富有建设性,我愿分享浅见,以抛砖引玉。他受到“中国结”的启发,主张把各种“文化中心主义”(他们的图示提到非洲、亚洲、欧洲、太平洋诸岛、美国印第安及其他)编织成像“中国结”的整体。从表面形式来看,仿佛这样在更高的抽象层次糅合以后,就超越了个别的文化中心主义了。但细想之后,我觉得有颇多问题必须商榷。其一,这个“结”不管怎么编织,总不能包含无限多的“文化中心主义”,到底哪些应该被纳入,要纳入多少才够扎实?其二,知识生产与分配必有权力与支配的关系,这个“结”的组成孰为中心,孰为边缘?美国的声音大于墨西哥,中国的声音大于越南,毋宁是自明的道理。其三,这种一加一式的勾结与链接,抹平或糅合为一块,就是“超越”吗?经过机械式的折中以后,祛除异以强求同,各组成部分就自然消弭于无形吗?还有,各种知识或文化体系背后都蕴涵了一些基本预设(presuppositions),预设与预设之间难道没有矛盾冲突?而一旦起冲突,当以什么语境来裁决?其四,这个“结”不可能靠自然的力量形成,而必须靠人为的努力,从各种文化系统中抽绎出普遍性与特殊性,进而综合之——然而谁被赋予超凡的能力,站在更高的视野来做这种综合工作呢?其五,每个“文化中心主义”内部有主流与支流之分,例如美国文化不是铁板一块,其主流文化和印第安人次文化的关系如何?

倘若不拿西方理论来套取中国经验,而大杂烩式“编结”也行不通,那该怎么办?我自己尝试从韦伯和现象学发展出一条路径:首先考察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路,然后沿抽象阶梯逐级上升,升在各个适当的点接触更大的文献,最后在地经验得以和全球视野沟通融合。这是强调从具体性慢慢上升到普遍性,而不是以普遍性抹煞具体性。当然,我们平常必须对理论有所吸收,才能活络思想,为问题和经验提供线索,从具体材料中窥视



背后的理论意义。要之,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吸收西方理论,但我们反对轻易奉之为圭臬,视之为标准答案,以致凌驾具体的经验分析。

## (二)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互相渗透

苏诗后两句仿佛暗示,跳出山外,方得认识庐山真面目。“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”,指的是一场棋局,看棋者因为没有实际利益的考虑,比较超脱冷静,往往比下棋者更清楚全盘棋奕的动向,也就是假定局外人有观察的优势。这种说法可能只对了一半。另外一半则质疑旁观者在局外看戏,纵能察知外缘的表象,毕竟事不关己,隔靴搔痒,焉能深入了解下棋者作为局内人的心理动向?这一推演,又可能片面陷入局内人的迷思了。

诗无达诂,通读整首苏诗,我觉得还是前两句——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——比后两句更重要。观察的位置、天气变化以及观察者的处境,都会影响视觉效果;不论在此山中或此山外,视野各有局限,只能看到局部的景物。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默顿(Merton, 1972)宣称,“局内人”和“局外人”的说法都找得到片面的例证,但毕竟各有各的盲点,所以最后必须互相交流渗透。

局内人拥有天赋的资格,例如天生的性别或肤色是难以改变的。但局内人没有垄断真理的权利,也不一定有特殊通道。假如把局内人的迷思推展到极端,终必酿成一场无比荒谬的灾难:譬如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,只有精神病人才了解精神病人,只有蜀人才懂得做川菜,而男人无法了解女人,白人无法了解黑人,现代人更无法了解唐宋的典章制度及当时士大夫的心理活动。类似的例子不断化约,上纲上线,可以无限繁衍下去。话语建构一旦本质化和绝对化到这个地步,毫无转圜或商量的余地,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必撕裂为碎片,全然没有沟通的基础;任何知识(不管是国际传播和新闻史,或地理与文化)的立足点势将荡然无存;中外古今的鸿沟无法逾越,最后甚至连纳粹那种灭绝人性的种族排外主义都变得合理。

须知“了解”是相对的,不是绝对的。了解也涉及不同的层次与面相。男人也许“不完全了解”女人,但绝非“完全不了解”女人。男人难道完全了解男人,我又何尝完全了解自己?在某个程度上,精神科医生不是比他的病患者更能透视病因吗?道理一以贯之,其他例子亦当作如是观,更应该适用于个人、社群、国家和跨文化各层面。新闻史研究发现常与变,跨国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梳理同与异(见下详述),但不应该庸俗地把这些视为二元对立。默顿认为,局内人也许比较了解日常生活熟悉的知识(acquaintance with),但局外人靠长期观察和深刻反思,获得系统的抽象知识(knowledge about)并不比局内人逊色。对局内人习以为常的事物,局外人却问得出新鲜的问题,提供不同的解释。更重要的是,默顿宣称人们的身份不是单一不变的,而是背负着一群“交叉的身份集合”(cross-cutting status set,或译为“身份簇”)。现象学家伯格(Berger, 1963)直说我们都是“复数之人”(plural persons),既是局内人,也是局外人,尽管组合的成分不同。

张隆溪(Zhang, 2015: 71-85)述评西方汉学家分析中国文化的派别,也有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。传统汉学家从西方现代化理论、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“刺激与挑战”以及

帝国主义视角分析中国,问题颇多。有鉴于此,美国学者柯文(Paul Cohen)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径,假定中国历史依照自己的轨迹发展,中国不是一个吸收外来因素的大容器。当然,依照中国“自己”的轨迹运行也只是程度的差别,中国不可能完全自外于周遭环境和国际情势;而学者在分析中国时,也往往把整体化为更小的单位(如地区或省份)。其次,法国学者朱立安(Francois Julien)从西方的立场为出发点,并以之为依归,只把中国视为“他者”,或是一面反照镜,其结果往往是证实他们自己的预设和范式。第三个取径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(Stephen Owen),则是东西或中外截然两分。第四种取径,如印度裔学者杜赞奇(Prasenjit Duara),他虽然承认很难以欧洲史的概念和理论分析中国史,也不相信民族主义的宏大叙述,但在实践上却大量引用当代西方的概念和理论,正好和“中国中心论”背道而驰。张隆溪在评介各种取径以后,最后落实到默顿关于局内人/局外人互相渗透的立场。

局内人和局外人终须回应“同情理解”的挑战。2016年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“多闻论坛”,主题是传播学与历史学、人类学的对话。这里介绍传播学与史学对话的部分讨论。<sup>③</sup>史学研究是材料与问题的对话。有的研究必须仰赖新材料,例如新出土的考古文物才能解答若干上古史的疑点;另一种研究则是靠新问题提供新视野,犹如聚光灯照亮了原来躲在角落暗处的人与事,使旧材料获得崭新的意义。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生教授的研究风格属于后者,他强调史料浩瀚无穷,如何提出新问题更重要。他指出“史料学”(傅斯年)和“在乡史观”(柯文)的局限,然后从海洋史的角度说明,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解释,在新的视野下却未必成立。他的研究显示,局内人(琉球或冲绳)对于钓鱼岛的史观便和局外人(中日美)迥然不同。我因此联想到辨识庐山的真面目,如何拼凑众瞎子所摸到的大象?我愿意相信,观点即使再歧异,过程即使再艰辛,彼此还是要做沟通的努力。现象学家称之为“negotiation”的过程,这个字在商场是议价的意思;在外交是谈判;在文化沟通,则是以善意试图进入对方的语境,经过反复的说明、辩难、揣摩和商量,达到心知其意的境界,建立彼此可以同意的底线,也找出那些虽了解但不同意的部分。这就是互为主观的同情理解。

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博士谈到史家如何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,而又与它保持适当的距离。人是一堆矛盾的产物,在不同的情境下发酵,既可殊途同归,亦可分道扬镳,同调又异态,因此呈现了个人与时代交涉的五彩缤纷。唐博士呼吁学者不带偏见地阅读史料,这是诚实的态度。但不带“偏见”并不是抛弃“预设”,因为没有预设是无法了解历史世界的,更不是以赎罪的心理,对异己的人事做过分浪漫的诠释。不带偏见,是要持平,要戒慎恐惧,提防被预设的盲点所蒙蔽而不自知,以致对材料做出选择性的解读。必也,不亢不卑,设身处地,对史料做“同情的理解”。最好是预设和史料能够做到水乳交融;万一史料不合预设,则只能调整预设,不能随便篡改史料。预设只是观察分析的工具,必须随着史料的开展或深挖而变动,譬如望远镜或显微镜不断寻找最清晰的聚焦,使概念或理论提供解释史料之助。

两位先生都涉及异见如何沟通的问题。对此,巴伦波恩和萨伊德有一连串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对话(Barenboim & Said, 2002),深刻入理。萨伊德说,只要双方都承认有异见存在,例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,历史虽不同,命运却缠绕在一起,认识了这个前提,双方便应该沟通,但毋须求同或投降。指挥家兼钢琴家巴伦波恩从音乐的角度说得更透彻:“你得保存极端(的声音),但找到联系,随时找到联系,这样会有一个有机的整体”(第69页)。如此说来,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寻找联系,而不是消灭或压抑刺耳的声音。交响乐本来就是各种不同乐器和不同音调的矛盾统一。

至于怎样建立极端与极端之间的联系,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,则饶富想象和创意的空间。西方有些国家的历史学家合写有争议的历史,中日韩学者开始合写历史教科书。两岸学者《新编中国近代史》(王建朗、黄克武,2016),有别于过去僵硬的革命史观,尝试透过新问题和新材料,互相切磋琢磨。此书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:台湾地区的史学界愈来愈愿意承认国民党最后在大陆的全面溃败,而大陆史学界也愈来愈肯定国民政府的主导抗日正面战场的角色。这象征着不同的(以前是敌对的)诠释社群试图透过和解和对话,获取“互为主观的理解”,求同存异,扩大共识面,并丰富了历史复杂的多元面相。在新闻史学界,也有人开始重新分析或评估若干以往被视为“定论”的人与事(如张季鸾、胡适、成舍我、《大公报》,甚至《新华日报》),只是整体而言步伐尚须大力迈开。

### (三)常与变,同与异

就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来说,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描述庐山当前景色的变与异,而没有关照到庐山的“过去”与“今日”,甚至“未来”之间的关系。换句话说,他似乎忽视了事物的“时间性”维度。对照之下,李白诗云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则是诗人对“时间”的咏叹。前一句形容人之“变”,逝者皆如斯乎,一旦光阴流逝,再也看不到古月;后一句形容月之“常”,照铄古今,不因人的世代变化而异。李白这两句诗生动地刻画辩证的两面性。阳中有阴,阴中有阳,正是代表这个深刻而平易的道理。

其实,苏轼绝非不重视时间性,也绝非不理解常与变的道理。常与变,既因事物存在的状态,亦因观察者的境界(horizon)、视野与心态,两者相互作用而成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写道,跟他一起泛舟的友人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,东坡劝他不必羡慕。他说:

客亦知夫水与月乎?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。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不尽也,而又有何羡乎?

世间之理必须“自其变者”(长江的一景一物每瞬间无不在变化)和“自其不变者”(滔滔长江,清风明月,皆万古不变)合而观之,才能获得圆融之见。这是值得时刻铭记在心的真谛。移步换景,境由心转,柳暗花明,这种直觉智慧的形象深合现象学之旨,只是西方社会科学擅用概念和逻辑来解释层层的现象。即如上引《赤壁赋》这段话——遑

论《庄子·秋水篇》海神和河神之间生动绝伦的对话——涵义极为浓缩而深刻,若以社会科学的逻辑溶解它,是可以铺陈写出一部大书的。

常言道,新闻是历史的初稿。新闻和历史都是社会建构。现在是过去的延续(常, continuities),也是过去的断裂(变, rupture 或 discontinuities)。我们对历史(包括新闻史)发生兴趣,一定是受到某种心理触动,可能呼应时代的关怀,产生有切己感的问题,希望回到历史的轨迹做“心智的实验”(mental experiment),以发现若干线索,促进了解。因此需要开拓丰富的历史想象,以引领学者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,从而在历史材料的挖掘中,言人所不能言,见人所不能见。这种想象不是胡思乱想,而是基于敏锐的问题意识、深厚的知识储备,以及充分掌握并善于解读材料。以今日的流行去臆度或剪裁过去的事相,厚诬古人,或为了现实的需要而曲解历史,都是缺乏学术诚实之品性的。

我喜欢观察改朝换代的众生相,在历史的时光隧道里,窥探时代的走向和关键人物的动态。这时候“常”与“变”最清楚地浮现出来,几乎无所遁形(例如 Chan & Lee, 1991)。为此,我尝试写过一篇论文《记者与时代相遇》(李金铨, 2013b),文长四万余字,自认这是一篇蕴含生命关怀之作。我选择以三位著名记者(萧乾、陆铿、刘宾雁)的生命史为个案,他们“再现了这几十年的时代精神,每每必须在时代变化的时刻抉择一条安身立命之道,不管选择哪一条道路,都必须付出沉重的承担。他们的心曲是个人与时代的纠葛,是大我与小我的互动,也都具有悲剧的色彩”(第405页)。我的旨趣是通过比较的视野考察异同,既以大见小,又以小见大,以探索时代、报馆和记者的交光互影。

“常”与“变”之于新闻史,犹如“同”与“异”之于国际传播。在一个国际会议上,有位美国学者报告他在8个东南亚国家做的问卷调查。他说就传媒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而言,8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分别。报告完毕,立刻引起了辩论,到底是“同”还是“异”更重要?有人说,我们以前偏重看“异”,以后应该多看“同”,言下颇有恍然大悟之意。我愈听愈不对劲,最后忍不住说:这么大阵仗,却没有发现差别,简直匪夷所思。究其原因有二:一是没有问对问题;二是使用的经验指标太钝,分析不到家。

庄子说:“自其异者视之,肝胆楚越也;自其同者视之,万物皆一也。”异中见同,同中见异,这是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智慧。社会科学是处理普遍性(同)和特殊性(异)的艺术,怎么可能像那位美国学者但见其同不见其异?同与异是一体的两面,也是互相蕴含的辩证。至于是大同小异、同异参半,抑或小同大异,则是经验的问题,不能让先验的假设来指挥。在这一点,我同意张隆溪(2000)的看法,要随时放在具体的环境来解决,“在差异强调过分时,就须指出文化之间也有相同或相通之处,而如果差异完全被抹煞,则有必要指出文化传统或政治制度之不同”(第83页)。这是允执厥中的道理。<sup>④</sup>

但一般来说,在社会科学,“解释异”要比“叙述同”来得有趣。以统计学为例,刚开始学的叙述统计重点在概括“同”(即平均数、中位数、众数等,顺带才讲标准差),后来学推论统计时,主要是衡量样本平均数之差异,并借助“显著度检测”(test of significance)去推论总体的误差。8个国家果真一样,岂不是几句话就“一言以蔽之”了?要是有同有



异,那就得费力“解释”有何不同,以及产生“异”的脉络、过程与前因后果。这个问题或因学科的发展与特性而异。钱钟书不太相信抽象的理论系统,而注重以笔记的方式疏证中(中国文本)西(佛经、西方文学哲学)文化相同和相通之处,以证明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”。余英时赞誉钱氏的渊博,但也指出钱氏讲同不讲异,“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”。又说:“相异之处,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,大的架构。所以他(钱)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,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”(傅杰,2010:160)。

总之,应该执普遍性(同)和特殊性(异)的两端,在各个层次上分析其“同中之异”与“异中之同”。过分向“同”或向“异”倾斜,都存在着分析上的偏差。而这个倾向又和学术的预设息息相关。余英时先生(1987)这段话说得最为透彻:

我们在比较中西历史和文化之际又不能特别注意其相异处。然而文化异同的层次是无穷的,并不能简单地、平面地、静态地分别为“异”、“同”两类。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观点细察中西某一方面的演变,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层层的异中有同、同中有异的辩证关系。有时部分之异不能掩盖整体之同,有时部分之同又不能掩盖整体之异。反之亦然。不但如此,更有时表面的相似正含蕴着实质上的差异,而表面上相反,却转而包藏着实质上的类似。文化异同的复杂现象阻止了任何的化约论的成立的可能性。(自序:65)

为免空发议论,我想举出传播研究的四个实例以说明之。

第一例,科技决定论者往往夸大科技的力量,在各种新科技问世时,都说成掀起了史无前例、惊天动地的变化。(事实上,每一次新科技出现时,学界所提的问题大体惊人地相似。)相反的,政治经济学家则贬低科技的力量,认为新科技不是在社会真空出现的,而须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,并进一步巩固原有经济基础的控制与支配地位。换言之,前者强调科技之“变”,后者强调政治经济基础之“常”。以我之见,不妨把这两个说法看成界标,当会释放出较大的解释空间,进而分析一些“中层”(middle-range)的问题,以新科技与旧科技的互动为例,考察沟通方式、日常生活、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“常”与“变”。

我愿在此援引两项自己的研究,以进一步阐述这条思路。其一,20个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极力要求重整“国际资讯新秩序”,颇有山雨欲来之势。我把“文化(传播)帝国主义”和“资讯自由畅通”两说视为互济的悖论(paradox),而不是水火不容的异端,并以比较性的个案分析断定,在不同的条件下(国家、议题、语境)两说各言之成理。在学理上和政策上,最后归宗于“自由而公平的资讯流通”(Lee, 1980)。我强调自由与公平不可偏废,基本精神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《多种声音,一个世界》(McBride, 1980)互通。其二,自由多元派的学者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垄断面,激进派则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垄断面,我以为在不同的条件下(政体、经济发展、资本形成)两说各有各的解释力,但在转型社会里,两说矛盾不安地交织着起作用(李金铨,2004:25-44)。

第二例,美国有多少新闻自由——关键是跟谁比,跟什么比?这类问题最好依托在“比较”的架构中考察“同”与“异”,结论才比较稳当。否则,在孤立的语境下,径自抬高或贬低美国的新闻自由,无非是根据自己的信念立下一个规范性的标准。我敢断言:美国的新闻自由不是全有或全无,既非虚妄的,亦非漫无边际的,因此必须把握它的能动性范围和边界。一般教科书形容美国的新闻界是行使“第四权力”的“看门狗”(watch dog),制衡并监督行政、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力。这是过分浪漫的想象。权力中心和媒介跳一支探戈舞,领舞者通常是权力中心,跟舞者则是媒介。与“看门狗”截然相反的,则是以乔姆斯基(Chomsky, 1990)为代表的激进派。他们抨击以《纽约时报》为首的自由派新闻界直如为权势建制服务的“哈巴狗”(lap dog),这点我将于稍后回来讨论。还有折中派(Donohue, et al., 1995)则认为新闻界是“导盲犬”(guard dog),虽为权势结构监看外在环境的变化,但未必听命或顺从于权势结构,这大概是比较中肯的见解。

与“导盲犬”异曲同工的是哈林(Hallin, 1986)。他说,如果新闻议题落入社会广泛的“共识区”内(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是正义的体现),媒介是权势结构的“啦啦队”,不太会去挑战广泛的社会共识;如果议题在“歧异区”内(即社会规范或价值普遍所不认可,例如妖魔化敌对的国家),媒介的口径也大致“从众”;唯有议题落入“有认受性的争议区”内(sphere of legitimated controversy),例如两党的争端、行政与立法部门的齟齬,此时媒介必须反映各方的立场,因而呈现其多元的客观性。这说明新闻的客观性是有其特定的语境的。我把美国精英报纸对外交政策的论述,概括为“建制内的多元”(李金铨, 2004: 120),其特征之一是“言论多元,却拘泥于官方既定的狭隘视野之内,也是‘统一中见分歧’,宛如唱出一个主题的几个变奏”。质言之,美国在国内的“民主自由”和在海外的“帝国主义”形象是并行不悖的。

第三例,怀疑派预设所有媒介都是为权力服务的。倘因而断言《纽约时报》和苏联解体以前的《真理报》是一丘之貉,那就只需要政治宣言,不需要严谨的学术分析了。假如分析的抽象层次一味上纲到制高点,得到的结论往往是“太阳从东边升起”般的常识(truism),因为那才是恒久不变的。有些学者眼里容不得一粒沙,以为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,其实天下的乌鸦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灰色,但他们却总认为这些深浅程度是无关宏旨的。

乔姆斯基是20世纪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公共知识人,但他用以解释美国媒介外交报道的“宣传模式”(Herman & Chomsky, 1988)却有上纲上线的倾向。《纽约时报》以“无惧无私”自许,大量证据显示历任总统都不敢对该报的批评掉以轻心,乔氏却指斥它为“官报”。他说,这类自由派媒介以公正客观为幌子,替统治阶级制造“必要的幻觉”(necessary illusions),充当美国恐怖超强的“宣传员”。他自诩写了几千页的东西,“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可说是证据确凿,其预测能力尤有过之;谁能对这个结论提出严重的挑战,我可没有听说过”(Chomsky, 1990: 9)。他怎么敢这样自信?在我看来,因为乔氏坚持“宣传模式”是不移的定论,他自可万变不离其宗,再多的个案也只见其同不见其异,

以致重复为先验的结论下注脚(详见李金铨,2004:263-276)。若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障言论自由,新闻界发挥“舆论监督”的功能,揭发了“水门案”丑闻,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——这些在乔氏看来,都不过是制造民主的假象,因为尼克松下台,福特上台,像跑马灯,但何尝动摇了既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(资本主义官商复合体)?不错,美国的体制相对稳定,恐怕很难发生他们心目中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美国媒介维护国家基本利益和主流核心价值,这是毫无疑问的,但它们抨击政府失策、官员渎职以及大公司贪婪却丝毫不留情面,我认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不应该被“宣传模式”所掩盖。

第四例,激进派看重大规模的“体制改革”(change of the system),认为“体制内改革”(change within the system)无非是为体制寻求延年益寿而已。有成熟的学者研究跨国的传媒与社会转型,例如俄罗斯、匈牙利和埃及(或其他国家),结论是支配结构并未因为政权递嬗而发生太大变化,一批新官僚和既得利益者取代旧官僚和既得利益者,反正换汤不换药,各国莫不皆然,故分别不大——听起来岂非和世界各国“太阳从东边升起”异曲同工?这样武断的结论从何而来?因为只有满足了高不可及的标准,他们才肯承认是真正的“转型”,其他的变化则是枝节而琐碎的。然而,调门提得这么高,话说得那么绝,选择什么国家当个案便显得次要,有时候未读到他们的分析已可预知结论了。其实,国际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到微不足道的变化,但生活在那个社会的局内人却可能感受到天壤之别,而这两种观点是应该互相关照和对话的。

第三第四两例都犯了全称命题的弊病,只论“有无”,不论“多少”,黑白两分,中间没有妥协或商量的余地。断定“有无”很容易,解释“多少”却煞费周章。因此,重点不在于美国有无新闻自由,而在于美国比哪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多或少?在哪个时期,或在哪个议题上,美国新闻自由的范围变宽或变窄,背后的原因何在?跨国研究亦复如是。全称命题太空泛,所以永远错不了,但解释力毋宁太粗疏,既看不到“常”与“变”的关系,也忽略细致的“同”与“异”。我联想到,《诗经》305首何其多彩多姿,给道家化约成“思无邪”三个字,倒是干净利落了,但文学韵味焉存?回到第四例,如果将分析的调门适度降低,这几个不同国家转型的权力舞台、演员和戏码,乃至观众(民意转向、社会运动的分合)难道一成不变吗?果如是,不如推出一个案例为总代表或标本好了,何须费事做细致的跨国分析?所以,假如只看“能动者”(agent,即社会演员)或只看结构(structure),而不看两者的复杂互动,都将导致分析上严重的盲点。

前面说到,天下乌鸦有深浅不同的灰色。交响乐指挥家的耳朵特别灵敏,听得出各种乐器和声音微妙的差异,画家眼中的色谱也不知道比常人宽出多少倍。学者要捕捉深浅不一的灰色,要探索人与社会的常与变、同与异,就不能只拿起斧头砍过去,更需要巧妙地使用绣花的针法。我喜欢的社会科学著作,要见其大,又能见其小,结构上要言不烦、提纲挈领、层次分明、因果严谨;但在分析上,每个主题又转折多致、柳暗花明、意义丰富。要之,社会科学讲求各种“条件性”(conditionality),无法像数学公式一样推演到其他习题,而全称命题却抹煞了这种“条件性”,看问题容易流于“一刀切”。社会科学旨

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、复杂性和矛盾性,要能见树又见林,分析的角度和结论跟随重要的条件而变化,条件愈清晰而明确,分析也愈细致入微。能够问出好问题,看出影响因果关系的关键条件,并赋表面的经验现象以深刻的理论意义,这些学术功力必须靠长期培养才行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傅杰,2010,《余英时谈钱钟书》,载余英时:《情怀中国》,香港:天地图书有限公司,第155—162页。
- 李金铨(主编),2013a,《报人报国: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。
- 李金铨,2013b,《记者与时代相遇:以萧乾、陆铿、刘宾雁为个案》,载李金铨(主编):《报人报国: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》,第403—464页。
- 李金铨(主编),2008,《文人论政:知识分子与报刊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/台北:政治大学出版社。
- 李金铨,2004,《超越西方霸权:传媒与“文化中国”的现代性》,香港:牛津大学出版社。
- 王建朗、黄克武(主编),2016,《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- 余英时,1987,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,台北:联经出版社。
- 张隆溪,2000,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》,香港:商务印书馆。
- 张冀峰,2016,《“盲人摸象”故事的真相如何? 完全不是我们所想的》,载《中华读书报》5月30日。
- Barenboim, Daniel & Edward W. Said, 2002, *Parallels and Paradoxes: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*, New York: Pantheon Books.
- Berger, Peter L., 1963, *Invitation to Sociology: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*, Grand City, NY: Doubleday.
- Berger, Peter L. & Thomas Luckmann, 1967, *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: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*, Garden City, NY: Doubleday.
- Berger, Peter L. & H. Kellner, 1981, *Sociology Reinterpreted: an Essay on Method and Vocation*, New York: Anchor Press.
- Carr, Edward H., 1964, *What is History?* London: Penguin.
- Chan, Joseph Man & Chin-Chuan Lee, 1991, *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: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's Orbit*, New York: Guilford Press.
- Chomsky, Noam, 1990, *Necessary Illusions: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*, Boston: South End.
- Donohue, George A., et al., 1995, “A Guard Dog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Media,” *Journal of Communication*, Vol. 45, Iss. 2, pp. 115–132.
- Gans, Herbert I., 1979, *Deciding What's News*, New York: Pantheon.
- Hallin, Daniel C., 1986, *The “Uncensored War”: The Media and Vietnam*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Herman, Edward & Noam Chomsky, 1988, *Manufacturing Consent*, New York: Pantheon.



- Kuo, Eddie C. Y. & Han Ei Chew, 2011, "Beyond ethnocentrism in communication theory; towards a culture-centric approach," in Georgette Wang (ed.), *De-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*, London: Routledge, pp. 172-188.
- Lee, Chin-Chuan (ed.), 2015, *Internationalizing "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"*, Ann Arbor, MI: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.
- Lee, Chin-Chuan, 1980, *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: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*, Beverly Hills, CA: Sage.
- Lee, Chin-Chuan, Joseph Man Chan, Zhongdang Pan, & Clement So, 2002, *Global Media Spectacle: News War over Hong Kong*, Alba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.
- Luckmann, Thomas (ed.), 1978, *Phenomenology and Sociology*, London: Penguin.
- Merton, Robert K., 1972, "Insiders and Outsiders: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," *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*, Vol. 78, No. 1, pp. 9-47.
- McBride, Sean, 1980, *Many Voices, One World*, Paris: Unesco.
- Mills, C. Wright, 1959, *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*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Robson, Robert, 2017, "How East and West Think in Profoundly Different Way," [www.bbc.com/future/story/20170118](http://www.bbc.com/future/story/20170118), January 18.
- Said, Edward W., 1993, *Culture and Imperialism*, New York: Knopf.
- Zhang, Longxi, 2015, *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*, Alba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.

#### 注释:

- ① 这些观点的大方向甚得 Berger (1963), Berger & Luckmann (1967), Berger & Kellner (1981) 和 Luckmann (1978) 之启发, 但由于转益多师, 许多具体影响的来源已不复辨识。
- ② 参见李金铨 (2004: 283-285) 对“亚洲文化模式”和“儒家文化模式”的评论。
- ③ 参见《学科的对话, 思想的碰撞——第二届“多闻雅集”的传播学术对话》, 载《新闻记者》2016 年总 400 期, 专题, 第 49—69 页。该专题包括张生:《新闻史研究的视野》、唐小兵:《瞩目于一个更广阔、纵深和细节化的媒介历史世界》, 以及五位学者与讲者进行的对话。
- ④ “BBC 未来”专栏作者若布森 (Robson, 2017) 的文章可为“同中有异, 异中有同”提供有趣的佐证。他引述大量研究证据说, 东亚人 (中、日) 偏向集体主义, 西方人偏向个人主义。但东亚也有内部差异。以中国而言, 长江以南的“种稻区”, 由于耕作劳力密集, 水利灌溉需要通力合作, 而长江以北的“种麦区”靠雨量, 所需劳力减半, 因此“种稻区”比“种麦区”居民更倾向集体主义。以日本而言, 北海道原来只有土著居住, 直到明治维新时才鼓励大量移民, 并从美国引进农业技术。研究发现, 北海道比本州 (仅在其南 53 公里) 居民更重视个人成就, 更有企图心, 其认知结构甚至更接近美国的拓荒精神, 而与日本其他岛的民众反而相距更远。

责任编辑: 刘 琼